



- ◎ 第一部 / 难忘黄昏
- ◎ 第二部 / 难忘黎明
- ◎ 第三部 / 难忘今宵

昨日时光

ZUORI
SHIGUANG



杨奇斌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杨奇斌 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在大型国企从事过工会、宣传、文化、电视、党务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出版了《逝去的岁月》《等待雨季》《大洋彼岸》《故乡的云》《相逢是首歌》《秋日往事》《采油树》七部小说，近三百万字。《昨日时光》是他第八部小说。他的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并被多种报刊选载，有的被改编成电视剧，还有部分作品介绍到了海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昨日时光
ZUORI
SHIGUANG

杨奇斌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杨奇斌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时光 / 杨奇斌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13-4760-6

I. ①昨…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4687 号

昨日时光

责任编辑 姚宏越 白 光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351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760-6

定价: 66.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卷首语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总有一些人或事，让你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宁，比如那段不平凡的知青岁月。

如今，知青的时代，已和人们渐行渐远，淡淡的，只剩下了一个符号。

为了把那段淡出人们视野的历史再拉进人们的视线，把那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知青再搬上文学舞台，今年夏天，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刻，在一个月的昼与夜的交替中，我将汗滴凝成了文字，便有了这本《昨日时光》。

全书共分三部，九十九幕。

每幕中，围绕故事的主要脉络，以镜头组合的方式，展现不同时空中的内容。

书中采用主线和辅线互相交织进行铺陈，立体全景式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命运。

在写作中，特别突出了知青在逆境中砺志，在危难时担当，在道德上操守的形象。让大家看到，这才是那一代知青跳动不息的脉搏。

在书中，力图将严肃的题材放到情感中去展现。写人性、人心、人情，努力展示人们心灵深处的善与恶，以及善与恶最终的结果。

写完全书，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轻松与疲惫。当小说里的各类人物次第扑面而来时，我不由得回过头来丈量，自己究竟与他们相距还有多远。

小说写完最后一笔时，忽然感到心中有一首歌想唱。于是，又有了歌曲《知青林》。这样，小说才很完整。

日后，我便循着歌声，找到我的读者，找到我的同伴，找到我心中的那片知青林。

作者

2014年7月于沈阳五彩园

第一部
难忘黄昏



[第1幕]

1968年的初秋。

萧瑟的秋风，又一次将街道两边儿的树叶儿染黄。

北方的秋，特别短。过了夏，秋就匆匆和冬对接上了。虽然树上的叶子还执着地恋在枝头，可每当一阵轻风吹过，便纷纷无奈地从上面飘落而下，杂乱无序地铺满一地。

风吹到了人们的身上，凉凉的，让人感到冬已将近。

就在这个秋天开始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也正式拉开了。

10月初的某日。

省城火车站。

站前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大标语：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非常耀眼。

广播里一遍遍地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广播的音量都调到了最大程度，仿佛震得整个站台都在抖动。

站台上挤满了人。

人群中，大多是到农村去下乡的知青，也有送知青下乡的家长 and 亲人。

知青中，有男有女，他们从十几岁的到二十几岁的不等。

送别的人中，有老有少，上至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弟弟妹妹，更多的是下乡知青的父母。

知青们心中有些激动。这是他们停课闹革命两年后的又一次命运转折，远方在召唤他们，那里有他们的期待。

送别的亲人们，则显得有些忧伤，因为他们对子女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有的在牵手嘱托，有的在掩面流泪。

分别的时刻到了。

火车吐着浓重的雾气，“哐儿”地一腔长啸，缓缓向前开去。

载着一列沉重。

送别的人群，像火车的附属物，粘在车厢外面，随着列车一起向前移动。

他们不停地挥手，除了嘱咐，还是嘱咐。火车的气浪淹没了他们的声音，却全然不觉。

火车走远了，站台上送行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

大家的目光依旧紧紧地和那前行的列车连在一起。最后，火车还是挣断了人们的视线，喘着粗气远去了，留下了一缕混浊的烟尘。

这列火车上，有一个以张海宁为首的十几个人的小群体，他们是钟玉、吴云、吴雨、何满子，李亮，刘果、司马平，李丽等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班级，自愿组成一支队伍，申请到了一个当时省内最艰苦的山区。

那时，上级对知青上山下乡有个规定，志愿申请到比较艰苦地方去的知青，可以不随本班走。

这些人之所以跟张海宁一起走，是有原因的。

钟玉，她家和张海宁家是邻居，也是世交，近年，她父母相继离世了，没有什么亲人，一直得到张海宁家的关照。从小到大，她对张海宁都一往情深，和他一起下乡是自然的。

吴云，她和张海宁是同班同学，平日对张海宁为人十分钦佩，由于自己出身不好，特想跟一个不歧视自己人一起下乡，这样心理上会增加一份安全感。

她走时，还带上了读初一的弟弟，吴雨。

其他的人，则是因为张海宁在文革前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学校各项活动中，都名列前茅，还是校学生会的干部，有很高的知名度。

“文革”中，他哪一派也没参加，也没揭发任何老师和领导，为人很正直，因此大家都信任他。

这个小群体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腾。

马腾和张海宁、吴云是同班同学。虽说他平时学习很一般，却因在文革中造反出了名，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他之所以没有和班级一起走，是另有打算的。

一是自认为曾经有过造反的光荣历史，还是造反派的头头，到农村肯定会受到重用。二是在班级里，他最喜欢的女生就是吴云，一直在心中暗恋着她。从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开始，他就关注吴云的去向，当得知吴云没和班级走时，他就下了决心，参加了这个群体。

火车驶出省城车站后，一路向西奔去。

车窗外是满眼的秋黄。

秋天是令人喜悦的季节。这一车人心中，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火车西行了几个小时后，到了水城。然后就转向南行，大约一小时后，到了一个叫石桥子的车站。再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没铁路了。

这是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老车站。

车站斑驳陈旧，像一位老人，在诉说着往日的苍桑。

站台上也挂着几条新写的欢迎标语。车站周围的墙壁上，残存着文革中打倒某某的字迹。让人自然联想到这座小城文革中的风雨岁月。

张海宁他们从这下了火车，改坐敞棚汽车继续前行。大约又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公社。

公社离要去的大队还有很长一段山路。在他们没到达之前，就有马车等候在那里。

他们到达后，每个知青都得到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有人给他们别在了胸前。

他们就上了马车，继续前行。马蹄踏在石头路上，咔咔作响。

马车路过的地方，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感到好像是钻进了山的缝子里，而且缝子越走越窄，硬是把快要落山的太阳挤得扁扁的。

车上的人有些窒息，发晕。

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到了最后的落脚地——瓦屋村。

这十几个人，就像十几颗种子，被撒在了这片贫瘠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各自的生命历程。

[第2幕]

这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子叫瓦屋村。

瓦屋村全都是草房，看不到一片瓦。对于瓦，老年人只是一种记忆，年轻人只是一种传说。

据说，当年这个村子是很富足的。村头至今还留有一高大石碑，碑文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当东北这块土地还没有人烟时，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一个老太太带领五个儿子，到此开荒种地。五个儿子皆为窑工，会打砖制瓦，建窑烧造。几年间，这里便建起一片瓦房，村子因此而得名。

可是到了小日本侵略东北时，为了不使抗日的人有藏身之地，在乡下实行了一种叫作“并户”的运动。所谓“并户”，就是将分散在山里的村庄都扒掉，把住户都集中赶到大的屯子里去住，便于他们看管。瓦屋村的所有瓦屋，就是在日本人这次“并户”中被全部毁掉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光复。故土难离的村民，又纷纷回到村里，在废墟上又建窑烧制砖瓦，经过辛苦劳作，不到两年的光景，被毁掉的瓦屋，又重新建造起来。

正当摆脱了奴役的村民准备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内战爆发了。

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解放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在这里打起了拉锯战。仗打得很惨烈，双方都想争夺村庄当掩体，你进我出，我出你进。经过这样的多次拉锯，最后解放军胜了，可是村庄也成了平地。

这里的原有住户都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了，有的说在战争中被打死了，有的说为了躲避战争逃到了更远的地方。总之，这里后来的居民已不是瓦屋村的后代，他们只是继承了瓦屋村这个名不副实的地名。

之后，这里就进行了“土改”。不久，这里的人们就和全国一样走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至今在村前的山崖上，还能看到那些当年残存的大字标语：“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合作化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自土改后，村子再没建瓦屋，那时土地归公了，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以粮为纲”。

时光到了1968年，瓦屋村中出现了一件大事情。这个封闭的小山村的村民，以前所未有的举动，迎来了一批新村民，那就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村民们赶着车，敲着锣鼓，从几十里外的公社，把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接到了村里。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村里还没有修好青年点，知青就散落在各家各户吃住。

瓦屋村张姓、王姓是两个大姓。当时的村革委会主任叫李东彪。这个村的历史上，都是张姓和王姓轮流执政的，怎么也换不到李姓来说了算的。“文革”来了，张姓和王姓都曾当过干部，那时干部就是走资派。李东彪就抓住这个机会造反，打倒了张、王两姓，当上了村革委会主任。

李东彪本名叫李冬苗。他是冬天冬月生的，他爹就给他起名叫李冬苗。因为在村里长期不得志，他就怪自己的名字不好。他想，冬苗，冬天里的禾苗，能不能被冻死吗？“文革”来了，他就趁机改名为李东彪。他想一个人占了两个伟人名字，肯定会给他带来好运。他真的如愿以偿，不久就当上了村革委会主任。

知青来了，给这个封闭偏僻荒凉的小山村带来了活力和生气。这些人的穿戴就和村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也和村里人不同。这些人早晨起来要刷牙，引来不少大人小孩围着观看。这些人上厕所用的是手纸，农村人上厕所用的是劈开的秫秸秆。每个知青都会唱歌，还有的会吹笛子，吹口琴。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寂静的小山村，一下子欢腾起来。

[第3幕]

李东彪有个妹妹叫李冬兰。

她和李东彪虽然是一母所生，品行却大不一样。她为人谦和善良，在村里人见人夸，长得也落落大方。李冬兰毕业于公社农业中学。所谓农业中学，就是公社对没考上正规中学的学生，由公社自己出资，办一所农业中学，讲课的内容和正规中学有所区别。正规中学培养的学苗，主要是为上一级高中、大学输送学生。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再升高中，也谈不上再考大学了。他们毕业后主要

是面向农村，哪儿来哪儿去，回到本村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学习的课程是会计、农业基础知识、果树栽培技术、木工、瓦工、兽医等方面和农村实际生产生活有关的知识。

李冬兰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毕业的。李冬兰学的是会计，可村里的老会计从土改干到如今，工作认真，为政清廉。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领导换了多茬，可会计一直由他干着，他不想干都不行，大家就信着他了。“四清”时，上面来的工作组把他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如今的账都封了，查了半年，硬是没找出分文差错。工作组也服了。因此，李冬兰回村后，是轮不上她来干会计工作的。

李冬兰虽然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却长得有些城里姑娘的模样，细皮嫩肉的，身材娇小，在农田里干活比不上那些五大三粗的妇女，和别人挣一样的工分，别人也有意见。

生产队长就出了个主意。因为村里偏僻，离学校远，路也不好走，好多社员家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都不能上学，特别是到冬天，北风烟雪，把路都给封了，别说孩子，就连大人也出不了门。就这样，好多孩子都是文盲，长大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一次社员大会上，队长说：“别让冬兰跟着大伙儿一起下地干活了，让她把咱村那些没上学的孩子管起来，每天到生产队的院子里，教孩子识几个字，我们给冬兰记工分。大家看怎么样？”

队长的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和赞成，因为这事代表了大家的利益。

就这样，李冬兰开始了她的所谓教师生涯。开学时，学生挤满了一院子，小的只有几岁，大的有十几岁。她没有课本，也没有课桌。来的学生都自带小板凳，有的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来的，乱糟糟一群。

教什么呢？先从认字开始。生产队院子里的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抹的黑板，平时用来写通知什么的，她就把它抹干净了当黑板，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两行字。这是当时最时兴的口号。再后来，就教孩子的姓名，父母的姓名，还有村里土地的名字。教这些字，是为了他们长大后，到生产队干活记自己的工分用。那时在生产队，虽然有记工员记工，可有点文化的人家，自己家还有一本账。年底，公家的账和私人的账如果对到一起，就没毛病了。如果对不到一起，就要说道说道。这样，记工员也不敢对有文化的人家记工马虎了。而那些没文化的人家，常常羡慕有文化的人家。

由于只有她一个老师，教学内容单一，学习的孩子也参差不齐，教学和学习

工作是在无序中进行的。时间一长，大一点的孩子都走了，家长着急让孩子回家干活，觉得在那儿浪费了时间。只有少数还不能干活的小孩子，还天天往那里送，送到那儿就全当送幼儿园了，能学多少算多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五个孩子。这时李冬兰教得也没兴趣，想对付到年底，结算了当年的工分后，就关门了。

李冬兰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将她许配了本村的张家，张家的儿子叫张宝发。这种从小由父母做主成亲的现象，在农村里是很普遍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可是在民间，这种情况依然顺理成章，成了一种潜规则。家长们认为孩子们的终身大事，就是要由大人来做主。虽然子女们长大后，对父母包办的婚姻有意见，但大人们感到，从前说过的话，是要算数的，绝不能反悔的。如果悔了婚，是件丢人的事，让父母在村里做人抬不起头来。

这样，李冬兰和张宝发都到了当婚当嫁的年龄，双方家长也积极张罗这件事。张家娶亲的吉日已经择好，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给女方准备好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外加十套新衣服、两套被褥。还准备好了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之类的物资，家里还养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

张宝发是家中的独子，张家也准备风风光光地办好这次婚礼。全村人都都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这次盛宴。在村里，一家有喜事，全村都沾光。到操办喜事那天，全村都不开伙，男女老少都到办喜事的人家里去吃饭，吃的肯定比自家的好。因此，村里提前就洋溢在喜庆的气氛中。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发生，李冬兰也会认可这门由父母做主的婚事。她也打算到了冬季农闲时，结束看孩子教学的事，规规矩矩地做个农村式的贤妻良母，重复着老一代村中女人的命运。

事情就发生在村里来了知青以后。在知青中，张海宁和钟玉两个人多才多艺。在学校时，他们不仅学习好，还都是学校业余的文艺宣传队队员和课外辅导员。来到瓦屋村下乡后，他们发现了李冬兰的小学，很感兴趣，就经常到那里帮助李冬兰辅导小学生。他们还从城里找来了课本，把上学的学生分成班，按学生的年龄教不同的内容。不仅教文字，还教数学、音乐、图画、跳舞，这样，一下子学校就活跃起来了。

他们不仅教孩子，还利用农闲、晚上、下雨天，教大人学文化，学和农业有关的知识。这种上学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不收学生一分钱学费，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真心欢迎。

社员们每天晚上吃完饭，有事没事都到那里去，那里成了社员们的精神乐园。张海宁和钟玉虽然累了些，但年轻人正是精力充沛的时期，有了学校，他们有了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心里也特别愉快。

随着学校的转机，李冬兰的婚期也一天天近了。转眼到了冬季，这农闲之时，也正是农村集中婚嫁之时。张宝发家正忙着筹备娶亲的事情，可是李冬兰却提出了推迟婚期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双方老人都着急了，本来定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变呢？她娘再三追问，她就一个理由：现在学校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婚事。

她娘说：“你那叫什么学校哇？那个学校说黄就黄了，还能干一辈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人家老张家把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财礼也给我们了，怎么能说推就推了呢！”

不管她娘怎样说服，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娘再劝她时，她就一言不发。你有千条妙计，她有一定之规。气得她娘大发雷霆，可她仍是岿然不动。李冬兰拒绝结婚的理由是工作忙，真正的原因只有她一个人最清楚，那就是和一个人的出现有关。这个人就是知青张海宁。

自从她见到张海宁第一眼，就深深被他吸引。随着张海宁到学校次数的增多，她愈加对他难以忘怀。张海宁不仅长得年轻，有气质，还有渊博的知识。他讲的每一句话，她听了都是那样的新奇有趣，还很幽默，富有哲理。如果没有遇到张海宁，她的未婚夫张宝发也算不错的青年。可张海宁的出现，让她发现世间还有这样优秀的青年。她把张宝发和张海宁放到一块比较一下，简直就没有可比性。于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就有了一种趋向，就像向日葵时时趋向阳光而忽略月亮一样。她感到在张海宁面前，张海宁就是老师，自己只能是个学生。张海宁在时，她感到内心里是那样愉悦和快乐。这种愉悦和快乐是从从来没有过的，就如阳光照在心头一样温暖和明亮。这种感觉是和张宝发在一起时所没有的，一丝一毫也没有。她设想，如果一生和一点感觉也没有的男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甚至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她不敢想下去，她想也许是上天的恩赐，让她遇到了张海宁，让她有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珍贵，强烈，难以寻找。所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地草率地把自己的青春生命交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没感觉的人。她暗暗地告诫自己，谁说也不能动摇。

[第4幕]

让她拒婚的理由终于出现了。事情还得从她毕业的那所农业中学说起。瓦屋村隶属于建玉公社，建玉公社原名叫接官厅。方圆几十里，都是山地，只有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平坦的地方，中间有条河蜿蜒流过，风景秀丽。新中国成立前凡有上面官员来视察，都在这个地方迎接，因此而得名。

解放战争时期，上面派来了一名叫李建玉的解放军政委，到此领导土改，并牺牲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他，就把接官厅改名为建玉公社。李冬兰毕业的那所农业中学，就是当时建玉公社办的。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建玉公社又分别成立了黑土岭公社和龙王庙公社。于是这所农业中学学生所需的费用，必须由三个公社来负担。这样就出现了问题，每个公社往学校送学生是照送不误，可是拿费用时却都不积极，推三推四的，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拖延和拖欠，一直到后来，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

1968年，在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下，正规中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大都停课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时，上级听说建玉公社有这样一所民办中学，它的办学方针，特别符合教育革命的方向，便想树立它为教育战线的典型。

一天上级领导带领一帮人，驱车前往建玉公社那所农业中学。当他们赶到时，发现学校还在，建玉乡农业中学的牌子还没摘，就是大门紧闭，没有一个学生。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小老头儿。

来的人问：“你是做什么的？”

小老头儿说：“我是看门儿的。”

来的人问：“你们的学生呢？”

小老头儿说“学校黄了，昨天吃的散伙饭。”

来的人问：“为什么黄了呢？”

小老头儿把黄的原因说了一遍。因为这所中学不是正规学校，不由国家拨款，是公社自己办的。教师也是由各村有实践经验的人临时担任，挣工分，也不固定，这所中学散伙时，也不必报请上级批准。所以，它黄了，上级不知道也不

足为怪。

来的人们遗憾惋惜，正想撤离，看门的小老头儿说：“你们想看这样的学校哇，再往上三十里路，到瓦屋村，那里还有一个学校，比这个还艰苦呢。”

原来这个看门人是李冬兰的堂伯，当然知道那里的情况了。于是这一伙人又驱车来到了瓦屋村。正好赶上李冬兰、张海宁、钟玉他们在生产队的院子里教学呢。这伙人看到，这里没有课桌，课桌是生产队喂牛用的牛槽子。没有座椅，学员们坐的都是自家带的小板凳。没有教室，教室是生产队养牛的牛棚。没有教师，教师就是三个挣工分的小青年。这里的学生参差不齐，男女老少，大的几十岁，小的只有几岁，教学内容不是正规的课本，而是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那场面相当地动人。这些人看后，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难寻觅。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教育革命的典型。

在来的人当中，有一位当时在全国都闻名并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当即表态：“这样的学校，完全符合教育革命路线的办学方向。别看学校条件简陋，但精神可嘉，意义重大。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我们办出了震惊全世界的抗大，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革命人才，今天我们贫下中农也能在牛棚中，办好自己的革命小学。没有教师，我们可以人人为师。没有教室，我们可以处处是课堂。没有教材，我们贫下中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编教材。过去我们的学校被封建统治着，把贫下中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的大门外，培养出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黑苗子。只有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办学校，才能培养出我们放心的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那位大人物还当即决定：“省市县三级教育部门，要马上派得力人员，到这里进行调查总结，拿出一份翔实的调查报告，供教育战线的所有人员学习。”

被吩咐的人不得有误，立即行动。不到一周，李冬兰艰苦办学的事迹就通过报纸和电台传遍了全国，李冬兰一夜之间成了名人。默默无闻的瓦屋村一下子成了热闹之地，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李冬兰除了教学和介绍经验外，还被任命为公社、县、市三级教育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她的命运就这样被戏剧性地改变了。她的责任更大了，她的工作更忙了，她推迟婚期的理由更充分了，她和村民张宝发的婚事也就这样无限期地放置下来。知青张海宁、钟玉也沾了学校和李冬兰的光，名字也上了报纸和广播。